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

The Changing Chinese
变化中的中国人

〔美国〕E.A. 罗斯 著
何 蕊 译

西方人审视东方大国的社会百态
直击旧中国之国民劣根性

译林出版社



The Changing Chinese

变化中的中国人

〔美国〕E.A. 罗斯 著
何蕊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化中的中国人 / (美) 罗斯著; 何蕊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4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

ISBN 978-7-5447-5296-1

I. ①变… II. ①罗… ②何…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②风俗习惯-中国-清后期 IV. ① K252.06 ②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709 号

- 书 名 变化中的中国人
作 者 [美国] E.A. 罗斯
译 者 何蕊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苏雪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296-1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本书作者 E. A. 罗斯是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曾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考察。当时正是辛亥革命前期，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明显的冲突，作者正是以这种文化冲突为视角，试图客观地描述中国社会。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状况。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人的体质与精神、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中国的环境、工业、禁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等。作者走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这些方面的观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由于作者是一位社会学家，因此其视角带有一定的专业性，他目光敏锐、老辣，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抓得很准，可谓入木三分。不过本书所采用的语言风格，并非逻辑严密的理论叙述，而是采用随笔式行文，形象生动，文笔优美，毫无学究气，读起来并无枯燥感。

除了对当时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描述外，作者还对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比较深刻的见解。比如环境恶化问题的根源以及救治办法；中西方人的体质差别及未来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的体质将发生的变化；中国工业的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禁烟运动的成败所涉及的因素；中国妇女地位的状况；中国教育事业的困境及解决方法……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和解析的时候，作者尽量让自己保持客观。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谁也没办法做到绝对的公正客观，本书作者在某

些问题上，就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书中的文字，始终带有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理解和关怀。

本书英文原著是在 1911 年发行的，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当初作者的那些预测，有些已经变为了现实，如中国工业问题、教育问题等；有些似乎正在朝其预测的方向发展，如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人的体质问题等。某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痼疾扎根于几千年的文化土壤，其转变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

古语有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国人的角度来看自身，有时难免会因为自尊或自豪而失于偏颇。适当地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看看自己，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对自身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作者所记述的虽然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人与事，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E.A. 罗斯写的这本书，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作，对于塑造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中国，这部著作受到重视是近年的事，目前已有多个译本。我们这个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前的中译本有所参考，以求奉献给读者的文字更完美。即便如此，文中仍然难免会有纰漏，还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前言

许多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想了解中国人，只花上大半年时间去中国各地旅行、观光、采访，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只有长时间居住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位在中国待了三十年的高级工程师说：“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反倒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人了。”一位商人也有类似的困惑：“我原本以为，只要在中国待上一两年，就能成为半个‘中国通’，但中国人实在太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外国人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似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哪怕是一个在中国通商口岸居住多年的外国人，都很难有勇气写一些关于中国人的东西，更别说那些只是来中国旅行的游客了。

情况也许没那么糟糕，因为在西方，也有一部分自信的家伙认为：中国人很容易了解。这些人熟知东西方人心理素质的差异，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只要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了解，理解中国人就易如反掌了。如果不排除物质水平的高低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让一个西方人从小就生活在中国，他同样会拥有和中国人一样的文化习惯。

很多东方国家的人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觉得要在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达成畅快的沟通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西方心理素质的差异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过，一些专门从事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的学者，却对此持一种

乐观的态度。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有文化方面的，如敬祖、父权制以及女性附庸状态；也有政治方面的，如闭关锁国、军事力量的减弱和“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总结出了诸多对于中国的认识。

E.A. 罗斯

目 录

1 / 译者序

3 / 前言

1 / 第一章 速读中国

17 / 第二章 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

29 / 第三章 从容、稳重的民族气质

41 / 第四章 生存是个重要问题

63 / 第五章 工业发展现状

78 / 第六章 为禁止鸦片所作的努力

99 / 第七章 妇女地位的变化

120 / 第八章 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影响

139 / 第九章 西部的人文地理

166 / 第十章 教育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 速读中国

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和欧洲中世纪时期十分相似的国家，那就是中国。那里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坚固的城门和高大的围墙，尽管历经风雨洗刷，这些城墙却没有丁点破损和残缺，其防御外敌的功能也丝毫不受影响。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则被中国的统治者——满族人，选作军队安营扎寨的国防要地，每当突发战事或者遇到外敌侵袭，满族人就进入这些城市，躲避灾难。

和坚不可摧的城墙相比，中国的街道则要逊色许多。中国城市的街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道路大都窄小不平，弯弯曲曲，脏兮兮的路面还时不时地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城市的公共交通具有鲜明的南北差异。在中国北部城市的街道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用骡子拉客的载人马车，满大街随处可见，它和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起形成了一派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但在盛产水稻的中国南方，情形却大不一样。骡子拉的马车几乎就看不到了，那里的人们用手推

车来解决出行问题。不然，他们就干脆步行。但由于交通规则或缺失，城市街道几乎被商贩们侵占，通行十分困难。随便想象一下：在一条不到两米宽的道路上，充塞着商贩、货架、柜台以及一排排用篮子构成的货摊，还有手工艺人和他们的工具，将会是多么的拥挤和混乱！幸亏权威机构有一条为坐轿腾出通道的规定，否则，街道会变得更加拥挤和狭窄。不过，即便是这样，也难以改写旅行者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街道拥挤不堪，城市人口众多，人口高度密集。但很少有游客真正科学地统计过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他们在游记中关于这点的描写，大多是一种感官上的揣测，再加上文学效果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事实。

中国的城市面积都不大，最大的要数北京了。低矮、宽阔的平房是中国城市的主要风景线。此外，还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些身穿统一黄褐色制服、手拿警棍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维持公共秩序，不过，这样的街景只是在最近才刚刚出现。一旦遇到动乱，这些警察就会不堪一击。广州的士兵大都不穿鞋，个个看起来萎靡不振，一脸和善，法律的威严根本无法从他们身上展现出来。

城市的公共设施十分匮乏，既没有公共用水，也没有公共照明。在一些傍水而建的城市，当地居民就依靠河水维持生活。挑夫挑着满满一桶的河水，挨家挨户地送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去往河边的石板路，终年都是湿漉漉的。由于河水未经过任何处理，遇到浑浊不堪，无法饮用的情况，人们就在竹筒里加入一些块状的明矾，然后将竹筒放到水里搅拌，不大一会儿，水就会变得清澈。

由于没有公共照明，每当夜幕降临时，城市就会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行人，气氛阴沉可怖。人们的照明设备十分简陋，最常见的两种是纸灯笼和花生油灯，点亮纸灯笼里面的蜡烛或者花生油碗里的棉灯芯，就可以看到光亮了。后来，随着煤

油灯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便利了很多。他们逐渐打破了规律的作息，不再按部就班地一天亮就干活，天黑就睡觉，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或者读书。

城市燃料的供应常常捉襟见肘，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自给自足，树木的枝叶、谷物的皮壳、干枯的杂草，凡是能够燃烧的花草树木，全被视为柴火，平日里用来加热泥炉、砖炉，煮衣、煮饭，到了冬天，就用来烧炕，以此抵御寒冷。不过，稳定供应的柴火并不是没有，伐木者盯上了茂密的森林，一棵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然后被加工制作成一捆一捆的干木柴，这些干木柴在广州和香港有很好的销量。在珠江的干流西江最繁忙的航道上，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运输船载满柴火，顺着河流的方向南下。伐木者寻找财富的脚步从未停止，他们甚至逆流而上，在河流的上游城市开辟新的市场，森林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

燃料的匮乏，也对人们饮食习惯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穷人家庭，为了节省柴火，他们常常去街上买熟食填饱肚子，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这个习惯无形中养活了那些以卖小吃谋生的人群，大街上的小吃摊点前总是人头攒动，生意火爆。不过，西方人很少去凑这个热闹，在他们看来，熟食是一种昂贵的食物，普通家庭是消费不起的。

如果走进中国内地城市的居民住宅，一定能在厨房看到一面黑乎乎的墙壁，几乎家家如此。由于房屋没有烟囱，灶炉生火时产生的烟雾总是直接喷到墙壁上，于是烟熏的黑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屋子的采光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光线被不设玻璃的门窗挡在室外，只有极少部分能透过粘上白纸的窗棂照射进来，内地的人们就在昏暗的环境里起居生活，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瓦片是铺设地面和屋顶的主要原材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用到泥土、砖

块，或者茅草。

这里讲到的是绝大多数内地人的生活环境，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大都过着一种清贫、简朴的生活。当然，富贵人家也是存在的，他们的房屋大都藏匿在一堵高大的围墙之内，若想一睹高贵华丽的风采，普通人是没有这个眼福的。

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宅子里，室内的陈设十分奢华：也许有价值不菲的瓷器、有美妙绝伦的工艺刺绣，也许还摆放着全世界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家具。不过，西方人在欣赏这一件件亮丽出彩的物件时，并没有完全被其魅力折服，一是因为它们的表面经常覆盖着灰尘，有时还有蜘蛛网，一些东西甚至出现损坏，但无论是宅子的主人还是仆人，似乎都对此视而不见；二是因为，若和西方的富人阶层横向比较，中国内地富豪的这份深受传统手工艺影响的儒雅，就相形见绌了。

中国人一向极少重视环境和物品的美观和卫生，这点和日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通常，人们对“中国”一词条件反射般的印象是：石砌的道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路面开裂倾斜严重；茅草屋破破烂烂，顶棚肮脏腐烂；寺庙的屋顶向下凹陷，泥瓦上布满苔藓，祭坊屏饰犹如一团乱麻；船舶用破烂不堪的草席搭建而成，根本没有遮风挡雨的作用；在乡村，随处可见粪便、污水池、水泥坑。中国人似乎对创造优美环境，清洁、修补事物这类事情毫不关心。所以，很难在内地城市看到为居民休闲而建的花园或者草地，顶多寺庙内会种植一些树木。究其原因，或许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不关心眼前的小问题，也不担心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如果要费尽心思修葺、保护旧有事物，还不如重新做一个新的。

日本的环境和中国完全相反。路面平整干净，道路两边看不到成堆的垃圾；墙壁被精心清洗过，草屋也被打理得十分整齐。眼所能及之处，都是一片干净、整洁的景象，哪怕是到了日本的乡村，依然保

持着这样整洁的风貌。日本人无法容忍破损、杂乱的事物存在，无论修补工程大小，他们从来不计较，大到加固堤坝桥梁、修整道路，小到翻修栅栏、墙壁、屋顶，他们毫不含糊。

倘若要在世界上列举出一些能够与之媲美的环境，我想只可能在荷兰、法国诺曼底、英国的一些地区或者美国境内侨民和新英格兰人集中居住的区域才能找到了。日本人一直享有讲卫生、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赞誉，一九一零年夏天那场令世人铭记于心的洪水发生后，日本人更加声名远扬。

谈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记忆，就不得不提到一种蓝颜色的棉衣，由于这种棉衣不易穿坏，十分受中国百姓欢迎。平日里，他们穿用棉布本色裁剪的深蓝色棉衣，这种衣服摸起来手感比较粗糙。在节庆日，他们就会穿上专门的服装，要么是做工精良的淡蓝色棉衣，要么是绚丽多彩的丝质外套。到了冬天，人们很容易从穿着上分辨出是穷人和富人：穿厚棉衣的是穷人，穿着一身丝质棉袄，棉袄还镶嵌有动物毛皮的一定是富人。

西方人的服装和中国完全不同，多是穿用毛料纺织而成的衣服。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推广毛料制成的西式服装，恐怕会因为原材料匮乏的问题失望而归。现在，中国的畜牧业还处在自给自足的阶段，大规模的养殖场风毛麟角，羊毛的供应量根本无法满足批量生产成衣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讲，中国人的棉衣是十分实用的，他们把开口留在衣服的侧面，扣上肩上的扣锁后，人的身体就能严严实实地躲在厚厚的棉衣里，即使是在北京遇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凛冽寒风，也能毫不畏惧。相比之下，西式服装的开口习惯实在太愚笨了，大大的V型开口，把人胸口以上的部位全部裸露在外，寒风肆无忌惮地往身体里灌，这个时候，你要是看到一个穿着粗布棉衣的中国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就跟一个衣衫褴褛的图腾崇拜者差不多。

在中国，政府通常会在城市主干道口修建一道拱形的大门，名曰牌楼。牌楼闻名于世，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一般由两门或者三门构成，样式各异，但造型都十分精致，有一种磅礴之气。建造牌楼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对一些事件或者人物进行表彰，不过战绩显赫的遇难士兵通常被排除在外，能够享此荣耀的人，单指一些在相关领域成就非凡的文人学士。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建造牌楼，一是因为牌楼的使用寿命能达到几百年，相当坚固耐用；二是因为胸怀博大的中国人需要通过修建纪念性的建造物来满足消费需求，同时借此传播仁爱之心。于是，在一些城市边缘的路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牌坊，这些牌坊延续精美的品质，但由于样式单调重复，谁看久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如果看腻了千篇一律的牌楼，去中国华南的城市看看，一定会有耳目一新的发现。在一排排简朴的平房间，耸立着一些近八层楼高的平顶塔楼，外有壕沟围绕，上有隐蔽的天窗，它们的外观和中世纪时的欧洲城堡的高楼极其相似。建筑可以相似，人的情感也有相同之处。十三世纪，比利时佛莱芒人和汉莎商人到伦敦讨生活，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十分强烈，如今，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异乡人也同样体验到和比利时人一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和同乡一起，成立行会，建造会馆，没记错的话，一批生活在西安的四川人、河南人、山西人，就在当地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三省会馆”。

在中国，当铺的功能十分强大，当你经济拮据时，可以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当铺换成现金救急，同时，物品又可以安安稳稳地被“寄存”在当铺行。要是遇上盗贼，藏身于当铺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换个角度来看，当铺既是银行，又是托管中心，还是避难所。

中国河流众多，在公路建设滞后、负重牲口良莠不齐的情况下，水路无疑是百姓出行、货物运输的最佳选择。因此，中国的船多得惊

人，如果把其他国家的船只加在一起，或许刚好能和中国的船只数划上等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的劳动力涌向港口和码头，使中国成为世界水上作业劳动力最庞大的地方，当然，中国船夫的能力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

船舶机械化程度不高，多是依靠人力划桨前行，所以总能看到甲板上奋力划桨的船夫。如果看到近二十多个光着胳膊的船夫正伴着船工号子的呼喊声有节奏地划桨，那一定是一艘大船。在顺风顺水时，船夫们比较轻松，但到了有些河段，船夫们不得不选择逆水行舟。这时，他们来到湿滑、陡峭的河堤，手里紧握纤绳，由于没有现成的纤路，他们必须一面用力拉船，一面探索纤路，翻越岩石、穿过狭小的壁架，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许多贫困的南方人一辈子过着水上漂的生活，在丢掉土地以后，他们不得不把家安置在舢板小船上，在天气晴好之时，他们的水上房屋，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连接游廊的独立单间。虽然远离陆地，但那里不存在地主、工头、老板，这使他们远离了失业、受剥削和工作的压力，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从来不会感到冷清、寂寞，因为在水上世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河水缓缓流动的声音，船只碰在一起时发出的嘎吱声，人们在一起唠唠叨叨的交谈声以及婴儿的咿呀学语的声音。水上人家的家居环境大都十分整洁，和荷兰人的家里一样干净，这和取水的便利是分不开的。住在水上的好处还远不止这一点，因为免交租赁税，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在任何喜欢的地方安家、随心所欲地选择邻居和居住环境。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心态十分开朗，即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们也从未唉声叹气过，在坚持简朴生活的同时，他们乐观快乐地享受着这份自由。有谁能像他们一样把日子过得如此自在、多彩的呢！

由于智力开发得较早，水上人家的子女大都聪明机智，这完全得

益于他们生活的环境。生活在水上，不慎落水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为此，孩子一出生，大人们便会拿出一个封好口的空坛子，然后把孩子用绳子系在上面，如果孩子掉进水里，大人只要找到坛子，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孩子了。这些孩子的智力发育速度比同龄人要快很多：一岁吋，他们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到了三四岁，他们的智力水平几乎相当于美国六七岁的孩子，他们学会了用竹竿撑船，用浆划船，用黑溜溜的、机灵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使得他们像意大利婴孩一样讨人喜欢，你会情不自禁地从腰包掏出铜钱，送给这些机智的孩子。

居住在城市的西方人，从来不会和农村打交道，但在重视亲缘关系的中国，城市人却保持着和农村家族的联系，即便是每晚例行关闭的高大城門，也无法阻挡他们的来往。前段时间，香港造船、修船业遭到重创，大量在码头从事水上作业的劳动力失去了生活来源，寻找新工作似乎是他们度过危机的不二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失业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冲击，这批人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农村，投靠家族大家庭，一边依靠祖先留下的家业维持生存，一边等待形势好转的那一天。但这样的待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家族中和女性同姓氏的亲戚，是没有资格长时间待下去的。

为了让后代不忘本，珍视血脉相承的家族关系，那些来自乡村、并在城市里赚了钱、扎下根的商人，会想出种种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和家乡接触，和农村的大家族产生联系。平日里，他们会捐款资助家族祠堂的日常保养、帮助家人购置土地。每年的家族宴会，他们还会送上一份象征吉利的烤猪肉。有了子嗣之后，他们会把儿子的名字记录在家族祠堂的名册里，到了节假日，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回到故乡探亲，让孩子和乡亲们交朋友，有些人甚至会干脆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乡村的大家族里。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从小就烙上了难以磨灭的乡土情结，即便是父母过世之后，他们对乡村的依恋也不

会消灭。恐怕只有他们家族的人在战乱、洪灾或者饥荒中全部丧命，才有可能隔断这样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团体，团体成员来自不同的小组织，散乱而缺乏集体精神，和真正的市民社会相去甚远。如果不建立起城市市政议会，并鼓励城市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激发他们的集体意识，则会很难使城市人的家族观变弱，从而不那么留恋乡土。

在中国，极难看到公墓，死者的墓地通常单独占居一块土地，选在家族所在的乡村。因此，随着山势高低起伏的座座坟墓便成了城市周边常见的风景。把死者的坟墓安置在如此显眼的位置，不能不让人对中国人的生死产生怀疑。在城市向外扩张发展的进程中，这些坟头必将成为阻碍。广东基督教学院的现状就能很好地证实这一点，该学校修建在墓地集中的区域，为了建设校园，学校前后签订了将近四百多份财产转让证书，但学校在向部分墓地主人购买土地时，遭到拒绝，直到现在，校园里还零星分布着一些墓地。

为死者设置灵堂是中国人的一种风俗，人们请来懂风水的相士占卜吉利的人葬时间，并挑选风水好的墓地。所以在这之前，安放死者的灵柩会在灵堂停留好几个月，时间长的能达到好几年。制作灵柩的原材料不是木板而是圆木，挖掉中间的部分，形成可容纳一人的空心，即做成了一口棺材。中国人的做法虽然足够虔诚，但无形中给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在中国华北的绝大多数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地貌景观便是黄土地，许多最富中国特色的观念的形成，便深受黄土地的影响。在地质学家看来，这些地方深居亚洲内陆，气候干燥、多大风，随之而来的尘土经过长年累月的累积，便形成了黄土，一些地区的黄土有五十多米之厚。不过，纵向观察过黄土的人会发现它是缺乏层次的，厚厚的黄土掩埋了植被、草地，因此，指望在黄土里找到海贝之类的东西不